

《贝拉罗莎暗道》中的记忆伦理书写

Ethical Writing of Memory in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郭丹阳 (Guo Danyang) 王 卓 (Wang Zhuo)

内容摘要：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贝拉罗莎暗道》以大屠杀非亲历者无名叙述者“我”的视角讲述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彰显了作者对大屠杀记忆传承这一记忆伦理问题的思考。叙述者由于记忆伦理失范导致民族身份危机，主要通过不可靠叙述呈现。从不可靠叙述到可靠叙述的转变体现了叙述者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认知与伦理选择，代表着记忆伦理复归对民族身份的重塑。此外，可靠叙述中的隐含作者声音既代表了贝娄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书写这一重要问题上的伦理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贝拉罗莎暗道》；记忆伦理；伦理选择；叙述可靠性；美国犹太文学

作者简介：郭丹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国家族裔文学与非洲英语文学；王卓，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诗歌和诗学、英语国家族裔文学、英语教育研究。

Title: Ethical Writing of Memory in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Abstract: American Jewish writer Saul Bellow's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tells the Holocaust survivors'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unnamed narrator, "I", who has never experienced the Holocaust, presenting Bellow's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Holocaust memory as an issue of ethics of memory. The narrator's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due to the failure of ethics of memory is mainly presented through unreliable narration. The narrator's shift from unreliable to reliable narrative reflects his awareness of his own ethical dilemma and his ethical choice, represen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return of the ethics of memory. Besides, the implied author's voice in the narrator's reliable narration represents the ethical choice of Bellow himself as a second-generation American Jewish writer o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Holocaust writing, and to some extent sets the direction for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ethics of memory; ethical choice; narrative reliability;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Authors: **Guo Danyang** is Ph.D. Candidate from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thnic litera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guo_danyang@163.com). **Wang Zhuo**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poetry and poetics, ethnic litera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English education (Email: wangzhuo_69@sina.com).

《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晚期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作为1989年到1991年间典型的四部大屠杀小说之一，代表了“二十世纪末期对大屠杀的回应”（Bach 78）。然而，与贝娄的代表性长篇小说相比，《贝拉罗莎暗道》在学界引发的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聚焦于大屠杀主题、创伤主题、记忆书写、身份建构以及叙事视角等层面。以上研究多数集中于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及其妻子索莱拉，对故事的无名叙述者“我”虽也有分析，但整体较少。然而事实上，无名叙述者“我”是《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关键人物，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无名叙述者“我”并非大屠杀的亲历者，“我”对大屠杀记忆的转述折射出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问题，这涉及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身份问题”（Weatherford 77）。如果仅仅聚焦于呈现大屠杀亲历者方斯坦的记忆，并不足以完整表达贝娄对族群历史延续与犹太身份认同的思考，也与贝娄此前创作的《赛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 1970）等作品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其次，无名叙述者“我”是一个经历了转变与成长的人物¹，“我”成长的标志为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从漠视大屠杀记忆到决心传承大屠杀记忆，重构了民族身份。以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然而，关于贝娄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叙事呈现自身对大屠杀记忆传承的伦理思考的，仍然缺乏具体而深入的论述。事实上，贝娄通过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可靠性与真实读者进行了间接交流，引领读者对大屠杀记忆传承问题进行伦理思考，提供了一个将作者的伦理意图融入叙事技巧的经典范例。

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有两大特点。第一，“我”的叙述可靠性存在明显问题，虽以不可靠叙述为主，但在大量的不可靠叙述中又偶有只字片语的可靠叙述出现。这一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我”的叙述中掺杂着两

1 参见 张军：“建构历史轴线——索尔·贝娄成长小说《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2013）：52。

种声音，即成长之前的声音与成长之后的声音，而在“我”成长之前的不可靠叙述中又存在着疏远型不可靠叙述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二者夹杂，使得“我”的叙述可靠性更具迷惑性，对读者进行伦理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我”的叙述看似零散繁乱，时间跨度大、涉及众多人物、事件，却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记忆”。索尔·贝娄通过引入无名叙述者“我”，试图讨论的问题是：未经历过大屠杀的美国犹太移民有义务记住大屠杀吗？而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记忆伦理的问题。

记忆伦理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更需要记忆的忠诚”（阿维夏伊·玛格丽特 10），主要涉及“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以及“如何表述记忆”（梅丽 109）等具体问题。记忆的伦理功能在于通过共同记忆把具有浓厚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诸如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因此，“记忆共同体是浓厚关系和伦理的栖息地。依靠这种粘合浓厚关系的核心功能，记忆成为指涉伦理的事业，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浓厚关系”（阿维夏伊·玛格丽特 8）。在《贝拉罗莎暗道》中，记忆伦理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美国犹太移民应如何对待大屠杀的创伤记忆。

在文本中，贝娄以未经历过大屠杀的无名叙述者“我”的视角讲述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呈现出部分美国犹太移民从忽视大屠杀记忆到选择传承大屠杀记忆而重构民族身份的历程，彰显出贝娄对记忆伦理的思考。“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表达形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89）。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文本，审视记忆伦理对于叙述者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的作用和意义，可以看出作者贝娄“鲜明的伦理取位是实现这一伦理写作的关键所在”（王卓，“‘不伦之恋’的伦理维度” 70）。叙述者由于记忆伦理失范导致民族身份危机，主要通过不可靠叙述呈现。叙述者从不可靠叙述到可靠叙述的转变体现了叙述者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认知与伦理选择，即认识到记忆伦理失范的严重后果，选择传承大屠杀记忆，重构犹太身份认同，代表着记忆伦理复归对民族身份的重塑。此外，可靠叙述中的隐含作者声音既代表了贝娄本人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书写这一重要问题上的伦理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记忆伦理失范与民族身份危机

小说中，无名叙述者“我”是一个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美国犹太人。不同于第一代从家乡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我”的美国身份认同更胜于犹太身份认同。作为大屠杀的非亲历者，“我”对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的大屠杀记忆持怀疑、排斥甚至是否定的态度。然而，大屠杀记忆作为犹太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已经成为犹太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部分。在小说中，贝娄通过“我”的不可靠叙述呈现了记忆伦理失范导致的民族身份危机。

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Booth 158-159）是否保持一致。根据“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价值/判断轴”三条轴线，不可靠叙述主要分为六种亚类型：“错误的报道”、“错误的解读”、“错误的判断”、“不充分的报道”、“不充分的解读”、“不充分的判断”（Phelan 51）。不可靠叙述能够“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申丹 134）。通过不可靠叙述所反映的“我”的思维特征中存在的问题，贝娄成功塑造了一个历史意识缺失，进而在主流社会同化中失去犹太身份认同的美国犹太移民形象。

在“事实/事件轴”上，无名叙述者“我”的讲述颇具迷惑性。在故事的开篇，无名叙述者首先强调了自己“费城记忆力训练学院的创始人”（175）¹的身份。此外，“我”还通过许多细节来炫耀自己的记忆力，比如“我”能在多年后清晰地记得和索莱拉首次见面时她的装扮，记得五十年前小学二年级老师的名字。然而，作为记忆专家的“我”却未能在“事实/事件轴”上成为一位可靠的叙述者。“我”成长之后的反思性声音却主动承认了自己无法在方斯坦夫妇的事件中把握真正的现实，即在“事实/事件轴”上形成了“不充分的报道”，其原因在于“我”的认知能力有限，即在“知识/感知轴”层面出现了问题。

在“知识/感知轴”层面，“我”的错误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无法理解并不愿接受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我”用“历险史”“好莱坞的连续剧”（184）形容方斯坦的幸存经历，用“荒诞玄学、荒诞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198）将索莱拉关于集中营的讲述荒诞化，称其为“大规模狂想”（198）。第二，“我”更无法理解他人对于大屠杀历史的关注。“我”的父亲尤为关注大屠杀这一犹太历史上的深重灾难，所以特别提出要见一见方斯坦，了解他的幸存经历。而父亲对大屠杀历史的关注在“我”的叙述中变成了“对难民故事很着迷”（178）。另外，成长之前的“我”始终以嘲讽的态度对待索莱拉的大屠杀研究，狭隘地认为“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她的丈夫”（198），无法认识到铭记这一重大灾难的伦理道德意义及其对于犹太历史、犹太民族身份认同的意义。不难发现，我在“知识/感知轴”层面出现的问题根源仍然在于“价值/判断轴”。

在“价值/判断轴”层面，“我”在历史记忆与民族身份两方面出现了严重偏差，形成了“错误的判断”。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以满不在乎的口吻宣称自己毫不理解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沉思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94）。“我”无法在大屠杀历史中找到共鸣与认同，甚至

1 本文有关《贝拉罗莎暗道》的引文均来自 索尔·贝娄，“贝拉罗莎暗道”，《索尔·贝娄全集（第12卷）偷窃 真情 贝拉罗莎暗道》，段惟本、主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彻底否定了历史与记忆的价值。共同的历史记忆往往是族群身份构建的核心要素,因此“我”在民族身份定位方面必然存在问题。“我”认为自己“在文明史上是人类类型中的新型”(180),并认为方斯坦应该忘记自己的悲惨遭遇,接受美国同化,“做个地道的美国人。好好做生意”(198)。总而言之,“我”更认同自己的美国身份,忽略甚至拒绝接受自己的犹太身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贝娄不仅以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展现出记忆伦理失范所导致的民族身份危机,同时以契约型不可靠叙述进一步深化读者对记忆伦理失范的伦理反思。“我”的不可靠叙述大多属于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对叙述者的报道、阐释和判断产生质疑,进而疏远叙述者。同时,“我”的叙述中也存在少量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其中“包括了隐含作者——因此也是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费伦 尚必武 295)。《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属于费伦所划分的第五种亚类型,即“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费伦 尚必武 299)。无名叙述者“我”成长之前的声音在自我辩护中间接承认了自己拒绝大屠杀记忆的原因之一为不敢直面大屠杀的暴行:“那帮人先是把你杀害了,然后又迫使你去思考他们的罪行。要我去想,我会透不过气来的。在原先的‘选择’、煤气室屠杀、火化尸体之上再加上迫使你去寻找原因简直可怕之极”(198)。贝娄有意通过契约型不可靠叙述提示读者,“我”对大屠杀记忆的否认是记忆伦理失范的结果,是对自身伦理责任的逃避。

二、记忆伦理的复归与“我”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

小说中,“我”由于记忆伦理失范导致了民族身份危机,而以记忆伦理引领“我”意识到我的伦理困境,最终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的正是方斯坦夫妇。尽管一开始“我”对索莱拉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感兴趣,时不时打断她的话,直言“我不想听”(198),但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我”认可了索莱拉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最终承认索莱拉的讲述“克服了我的抵抗情绪”(197),在聆听过程中,“我不禁被引导去思考一些问题”(198)。方斯坦坚持与救命恩人比利·罗斯见面表达感激,与妻子一同参观耶路撒冷的种种行为,都在以实际行动强化着“我”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方斯坦夫妇始终在以各种方法帮助“我”实现记忆伦理的复归。

在追溯方斯坦夫妇故事的过程中,“我”梦见自己长时间被困于一个洞中,并且意识到这个洞是一个对“我”很了解的人有意挖成的。“我”被困的洞象征着“我”对自身伦理困境的认识。最终,以另外一个成长之后的“反思性声音”主动对“我”之前的一系列不可靠叙述“进行了一场有关伦理和道德的自我审判”(武跃速 蒋承勇 7),最终纠正了自己在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方面的错误报道、认知与判断,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通过记忆伦理的复归实现了民族身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我”的疏远型不可靠叙述在三

条轴线上均转变为可靠叙述。

首先，在“事实/事件轴”层面，“我”承认了自己在方斯坦夫妇事件中把握事实的局限性，这表明“我”认识到自身在“知识/感知轴”上的存在的问题，在“知识/感知轴”上，“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感知大屠杀历史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思了自己长期切割民族历史的行为：“我发现长期以来我在四周竖起盾牌不让难以忍受的想象侵入——不，不是想象，而是承认——对谋杀的承认，对有人热衷于酷刑的承认，对野蛮行为是一种基础低音的承认，而没有这基础低音人类音乐便无法演奏”（249）。“我”意识到幸存者的意义在于提醒世人灾难的真实存在，正如布鲁姆所言：“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磨难中，幸存的概念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Bloom 127）。“我”也理解了索莱拉与父亲对犹太历史的关注的重要意义，即“还原大屠杀历史真相，并期望犹太人谨记民族历史，培养历史意识”（张军 54）。

在“知识/感知轴”上的纠正最终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价值/判断轴”上的问题。首先，在历史记忆方面，方斯坦在集中营中的苦难经历以及索莱拉对大屠杀的关注潜移默化地让“我”重温了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帮助“我”认识到记忆的重要意义：“如果睡眠是忘却，忘却也就是睡眠，而睡眠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等于死亡与生命的关系”（259）。方斯坦夫妇去世的噩耗令我“我”意识到传承大屠杀记忆的紧迫性，“我”最终认可了索莱拉对大屠杀的观点，即“我们有特殊责任来正视它”（225），感到“犹太历史的闪光小点正在向我逼近”（231）。

其次，对民族历史的承认帮助“我”重构了民族身份。在身份定位方面，“我”成长后的反思性声音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危机，即“我并非我心目中的我”（247），“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后裔是要付出代价的”（248）。此外，“我”在谈及贝拉罗莎暗道创始人时评论称，作为商业大亨的比利虽然看上去奢侈轻浮，但是“流淌的主流却是他的犹太民族性”（185），“我”开始逐渐认可犹太身份与犹太民族性，而并非如从前般简单地执着于维护自己的美国身份。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从不可靠到可靠的转变体现了“我”的成长，即“我”在伦理层面的认知发展。“我”的可靠叙述代表着记忆伦理的复归，“我”在记忆伦理的影响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历史意识缺失与身份定位的错误，并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伦理意识”（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6），从伦理上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即作为非亲历者决定铭记并传承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进而实现犹太寻根，强化自己的犹太身份。

此时，与一开始“我”对方斯坦的故事所做出的缺乏感情、充满嘲讽的回应相比，“我”已经向贝娄的伦理观念上迈进了一大步。此时，作者的读者开始在伦理上走近无名叙述者，成长小说的伦理教诲功能得以彰显。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的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

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¹贝娄恰恰是通过叙述者的可靠叙述呈现出记忆伦理复归的重要意义，同时实现了自己的伦理意图，即引领美国犹太移民承担历史责任，传承大屠杀记忆，重构犹太身份。

三、贝娄的伦理选择与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并非贝娄本人，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代表贝娄所属的第二代犹太裔美国群体。他们未曾亲身经历过屠杀，并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同化中几乎丧失了族群归属感与犹太身份认同。贝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才选择了无名叙述者“我”对方斯坦的故事进行转述。同时，贝娄作为隐含作者的声音在“我”的可靠叙述中时隐时现，比如“我”成长之后对于大屠杀的承认，对于比利“犹太民族性”（185）的肯定都带有隐含作者的影子，此时，“叙述者的伦理取位以及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是相互联系的”（尚必武 104）。隐含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表达了对种族历史和族群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小说结尾，贝娄更是直接借叙述者之口，明确表明自己要承担起记录“贝拉罗莎暗道”的责任。成长后的“我”发现美国犹太移民中普遍存在着历史意识缺失、身份定位模糊的问题，比如看管方斯坦夫妇房屋的年轻人对犹太历史毫不在意，甚至取笑“我”的犹太情感。所以最终“我”决定承担起大屠杀历史传承的责任，“把我记得的一切有关贝拉罗莎关系网的事记录下来”（259），去影响与改变犹太移民群体中记忆伦理失范的现象。

此时，叙述者的声音与隐含作者的声音完全合二为一，叙述者的伦理选择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贝娄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书写问题上的伦理选择。1990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反思，坦言并不认为准备写作《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时自己已经成熟，因为当时“许多东西我还能吸收，〔……〕大屠杀就是其中之一”（“半生尘缘”387）。贝娄自述前期的写作更多集中于自己的美国生活，直到去了一次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才充分意识到那场浩劫的分量”（“半生尘缘”387）。贝娄在采访中特意提及了《贝拉罗莎暗道》，承认自己一直“没有注意到一些大事的重要意义”，认为“直到《贝拉罗莎暗道》以前，我一直没有做到”，并明确表示自己应该“履行几项被忽视的使命了”（“半生尘缘”388）。因此，在《贝拉罗莎暗道》的创作中，贝娄鲜明的伦理取位使无名叙述者“我”的可靠叙述“带有一种明确的责任感”（王卓，《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434），以负责任的伦理写作态度和方式²承担起了传承民族历史、重构犹太身份的使命。乔国强认为，这篇小说为贝娄“发展中的犹太性矗立了一块醒目的界碑”（89）。此后，贝娄的创作发生了重要转折，即从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2 参见 王卓：《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438页。

关注所谓“普世意义”到对自己民族特别是对“二战”犹太幸存者和犹太移民美国化问题的关注。

贝娄的伦理选择不仅代表了自身的创作成长，也引领了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的创作方向。纵观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美国犹太作家的代际划分主要依据作家所处的年代及其创作主题。第一代美国犹太作家生活在移民初期，其作品以坚守传统为主题。贝娄则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写作主题大多涉及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同化过程，其作品中“美国主体文化思想的特性往往比犹太文化思想的特性表现得更加显著”（曾令富 130）。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崛起，他们致力于“重新寻找和恢复自己的种族文化，以取得群体感和认同感的立足点”（曾令富 135）。在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比如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纳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等人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不再专注于同化主题，不再对犹太身份、犹太性等问题避而不谈，而是关注自身文化传统，积极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比如，迈克尔·夏邦的“多数作品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主人公，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依然是犹太民族的身份”（李锋 5），纳森·英格兰德的短篇小说《帕克大街的灵魂转世》（“The Gilgul of Park Avenue”, 2000）中的“转世”意味着离开美国主流文化，回归犹太传统。

可见，《贝拉罗莎暗道》中无名叙述者“我”的叙述可靠性转变既代表了贝娄本人的伦理选择，表现为贝娄的创作成长，某种程度上也引领了犹太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三代作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回归犹太性这一过程中的痛苦挣扎，体现了当代美国犹太移民面临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这意味着贝娄对于大屠杀记忆与犹太身份认同的伦理思考在今天对于当代美国犹太移民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Works Cited

- Bach, Gerhard. “Mem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Narrative Strategies Against Forgetting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Holocaust.” *Jewish American and Holocaust Literature*, edited by Alan L. Berger and Gloria L. Croni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77-91.
- 索尔·贝娄：“贝拉罗莎暗道”，《索尔·贝娄全集（第12卷）偷窃 真情 贝拉罗莎暗道》，段惟本、主万译，宋兆霖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Bellow, Saul.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aul Bellow (Volume 12): A Theft, The Actual,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translated by Duan Weiben and Zhu Wan, edited by Song Zhaoli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 ：“半生尘缘”，《索尔·贝娄全集（第14卷）集腋成裘集》，李自修译，宋兆霖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A Half Life.” *The Complete Works of Saul Bellow (Volume 14): It All Adds Up: 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translated by Li Zixiu, edited by Song Zhaoli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Bloom, Harold. *Saul Bellow: Modern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1.

李锋：“《犹太警察工会》中的空间政治与弥赛亚主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2021）：5-15。

[Li Feng. “Spatial Politics and Messianism in *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 (2021): 5-15.]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He Hairen. Beijing: Tsinghua UP, 2015.]

梅丽：“越战小说中的记忆伦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15）：108-113。

[Mei Li. “Ethic Memory in the Novels about the Vietnam War.”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2015): 108-1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Nie Zhenzhao.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Cornell UP, 2005.

詹姆斯·费伦、尚必武：“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事伦理”，《世界文学评论》2（2008）：294-302。

[Phelan, James and Shang Biwu.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 Bonding Unreli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Lolita*.” *The World Literature Criticism* 2 (2008): 294-302.]

乔国强：“论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贝拉罗萨暗道》”，《外语研究》6（2010）：89-92。

[Qiao Guoqiang. “On Saul Bellow’s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6 (2010): 89-92.]

尚必武：“叙述谎言的修辞旨归：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述’观论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2008）：101-105。

[Shang Biwu. “The Rhetorical Objective of Unreliability: An Inquiry into James Phelan’s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5 (2008): 101-105.]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4（2006）：133-143。

[Shen Dan. "What is 'Unreliable Narr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6): 133-143.]

王卓: “‘不伦之恋’的伦理维度——从《洛丽塔》的悖论式误读说起”, 《山东外语教学》4 (2015): 69-79。

[Wang Zhuo.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Incestuous Love'."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4 (2015): 69-79.]

——: 《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 丽塔·达夫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

[—: *The Poetic Life and World Reflection of Black Venus: A Study of Rita Dov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2.]

Weatherford, Kathleen Jeannette.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and the Hazards of Forgetfulness." *American Studies in Scandinavia* 2 (1992): 65-82.

武跃速、蒋承勇: “记忆对忘却的人性审判——论贝娄《贝拉罗莎暗道》中的道德哲学”,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5 (2011): 5-10。

[Wu Yuesu and Jiang Chengyong. "The Moral Judgment on Forgetting History: On Saul Bellow's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5 (2011): 5-10.]

曾令富: “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新倾向”, 《外国文学评论》4 (1995): 130-135。

[Zeng Lingfu.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1995): 130-135.]

张军: “建构历史轴线——索尔·贝娄成长小说《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研究”, 《当代外国文学》2 (2013): 51-59。

[Zhang Jun. "Decoding the Mentor Figure in Saul Bellow's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3): 51-59.]